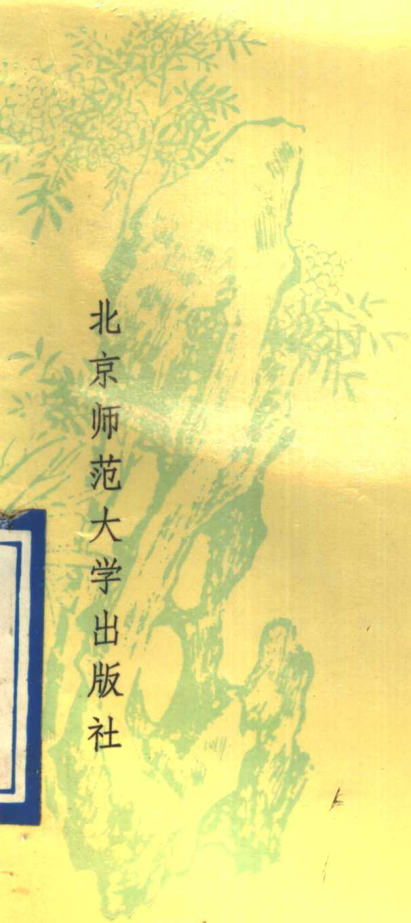


歐陽修論稿

劉德清 著
郭預衡 審訂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欧 阳 修 论 稿

刘德清 著 郭预衡 审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6 千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303-01118-8/I·66

定价: 6.20 元

欧阳修论稿序言

这本《欧阳修论稿》，是我看到的迄今为止的最全面地论述欧阳修的专著。

我是写过几篇关于欧阳修的文章的，而且有过进一步全面论述欧阳修的打算。今天读了这本《论稿》，我感到自己的文章可以不作了。鲁迅当年为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重版作序，曾有“大器晚成，瓦釜以久”的话，我现在为这本《论稿》作序，感觉恰好相反，觉得大器已成，瓦釜可以不作了。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大家。他的文章成就最高，但他不仅是个文章家，他于诗、词、辞赋，都有独特的成就，可以说是“文备众体”的大作家。

欧阳修还不仅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与宋祁等会编了《新唐书》，又自著了《新五代史》。在“廿四史”中一人而兼两部著作，且各有特色，实属难得。

欧阳修又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经学家。他对于《周易》、《毛诗》、《春秋》、《周礼》等儒学经典都有研究，且有创见。苏辙曾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至宋而新义日增，推原所始，实发于修。”不仅有所创见，而且曾开风气之先。这是很难能的。

欧阳修又不仅是经学家，而且是金石学家。所撰《集古录》，为“金石录”之开创性的著作，所作“跋尾”，亦金石题跋之先河。

此外，所著《六一诗话》，也可以说是“诗话”专著之始。从这样的著作看，欧阳修又可以说是文学评论家。

自唐代以来，作家能诗又能文者不多，能文又能诗者亦少。文学而兼史学者偶然有之，但兼经学者就更少见。象欧阳修这样“文备众体”，又兼史学、经学、金石之学等等的学问家，就更不多了。宋代产生了这样的新人，欧阳修尤为突出者。

还有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为人之“刚正不阿”、“难进易退”，在士大夫一流文人学者中也极为难得。他的人品和文品，不仅曾为他的政见相同或相近者如苏洵父子、韩琦、曾巩等人所称颂，也为政见不同者王安石所赞赏。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里说：“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又说：“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遭困蹶，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王安石对欧阳修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虽是撰写祭文，并无媚死谀墓之意，因为所言者符合其人的实际。

对于欧阳修这样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很难得的大作家，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写出专著的。

本书著者刘德清同志，于欧阳修谊属同乡。对于乡之先贤，志在表彰，却非溢美。凡所论列，皆从实际出发，没有架空之论。语皆平实，也少有令人费解的词汇。文风是质朴的，功力是深厚的。这样的著作是难能而可喜的。

当然，象这样切实的学术著作，在当今的某种情况下，未必能够畅销，难得经济效益。但我仍然抱有幻想：在十亿以上的众多人口中，也许未必没有万分之一的读书人、不负这苦心的著者！

郭 预 衡

1991年2月序于北京

目 录

欧阳修论稿序言·····	郭预衡 (1)
第一章 欧阳修生活的时代·····	(1)
第一节 宋王朝积贫积弱, 由盛及衰·····	(1)
第二节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8)
第三节 宋代文人的优越地位·····	(14)
第二章 欧阳修的家世与生平·····	(18)
第一节 欧阳修的籍贯·····	(18)
第二节 欧阳修的家世·····	(23)
第三节 欧阳修的生平·····	(36)
第三章 欧阳修的人格·····	(62)
第一节 性格刚正 直道行事·····	(63)
第二节 襟怀坦白 宽厚待人·····	(68)
第三节 奖掖后学 爱人以德·····	(74)
第四节 谦虚谨慎 廉洁奉公·····	(81)
第四章 欧阳修的政治理论与实践·····	(91)
第一节 欧阳修的政治理论·····	(92)
第二节 欧阳修的朝政改革主张·····	(101)
第三节 关于经济、军事、外交改革的主张·····	(116)

第五章 欧阳修的经学研究.....	(129)
第一节 欧阳修的经学思想.....	(130)
第二节 欧阳修的《诗经》研究.....	(137)
第三节 欧阳修的《易经》研究.....	(149)
第四节 欧阳修的《春秋》研究及其它.....	(157)
第六章 欧阳修的史学著述.....	(164)
第一节 欧阳修的史学观点.....	(164)
第二节 欧阳修与《新唐书》.....	(172)
第三节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177)
第四节 欧阳修的其它史学著述.....	(187)
第七章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上).....	(200)
第一节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200)
第二节 欧阳修的诗.....	(210)
第三节 欧阳修的词.....	(220)
第八章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下).....	(235)
第一节 欧阳修的议论文.....	(235)
第二节 欧阳修的记叙文.....	(242)
第三节 欧阳修的抒情文.....	(253)
第四节 欧阳修的散文风格.....	(262)
第九章 欧阳修的地位与影响.....	(277)
第一节 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中的领袖地位.....	(278)
第二节 欧阳修的开创性贡献与辐射形影响.....	(286)
第三节 关于欧阳修的祠祀.....	(293)
后 记.....	(1)

第一章 欧阳修生活的时代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和政治家。他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享年六十六岁。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北宋中期。这个时期，既是宋代历史上繁荣鼎盛的时期，也是宋王朝积贫积弱、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指陈时弊，呼吁改革，尝试朝政和经济体制的革故鼎新。在这个时期里，封建统治者实施宽松、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士大夫待遇优厚，思想活跃，创造性强，封建文化全面繁荣。

第一节 宋王朝积贫积弱，由盛及衰

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赵宋王朝。作为开国君主的太祖、太宗两代，为了防范藩镇割据势力的再起，奠定赵氏基业的长治久安，避免唐末五代易君如易棋子的历史悲剧重演，他们听取宰相赵普的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记载：

一日，（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由此可见，宋太祖夺取政权之后，已经意识到武将专权、以武治国的弊端。为了使自己免于重蹈晚唐五代亡国的覆辙，他采纳了赵普的建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把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以自己为首的中央政府手中。

“稍夺其权”，指集中政权。在政治上，宋太祖调整并改革朝政体制，设立“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三司”（盐铁司、度支司、户部司）等新机构。为了减少宰相的震主之威，改由枢密使执掌军事，三司使管理财务，宰相只是主持行政。又设立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原先事无不统的宰相职权，而今一分为三，互不干预。他又将原先由武将任职的地方高级官员，逐步改为由文官担任；把过去由地方任命的县级以上官吏，改为由朝廷直接派遣，并且规定任期，三年一届。又设立御史台，提高谏官地位，实行台谏职责合一，加强对宰相及各级官吏的监督纠劾；还缩小行政区划，建置重叠的官僚体制，使其相互制约，最终一切听命于中央，听命于皇帝。

“制其钱谷”，指集中财权。鉴于唐天宝以后，藩镇割据，赋税自取为用，甚至擅自厚敛取利，藉此抗衡中央，宋太祖尽革其弊，集财权于朝廷。南宋叶适说道：“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①的确如此，早在建国之初，乾德二年（964）朝廷下诏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②按朝廷规定，赋税、榷利（专卖收入）由设在各路的转运使主管，由朝廷分派各地的“监当使臣”监收，地方官吏不准插手。各地财政收入，只允许扣除少量的地方费用，其余如数送缴京师，不得藏之于民，更不得藏之州郡。财力集中于朝廷，地方失去同中央抗衡的经济实力。

^① 叶适《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

^② 《长编》卷5

“收其精兵”，指集中军权。宋太祖登基伊始，就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职务，并且改革兵制，分全国军队为禁军、厢兵、乡兵、藩兵四种，其中禁军名为皇帝卫队，也是国家正规军，厢兵、乡兵中的精悍者收归禁军。乾德三年（965）八月，朝廷“令天下长吏择本道精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以木挺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①禁军分别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三衙”管辖，三家互不统属，各自听命于皇帝。即使是执掌军政的枢密使，也不能直接指挥禁军，但是，他与“三衙”将领有着互相牵制的作用，前者有制令之权而无握兵之重，后者有握兵之重而无制令之权。同时，禁军实行“更戍法”，“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②，军队不时更换屯驻地点，有意地制造“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③的局面，防止武将拥兵自重，裂地为王。

总而言之，宋太祖开国之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所采用的措施，其精神实质，就如宋太宗即位时大赦天下的诏书中所说的“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④。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束缚人们的手脚，使之互相牵制，彼此制约。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强干弱枝”^⑤，“内外相维”^⑥，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专权，保卫皇帝的绝对权威，这就是所谓的“祖

① 《长编》卷6

② 《长编》卷301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

④ 《长编》卷17

⑤ 《宋史》卷293《王禹偁传》

⑥ 《宋史》卷187《兵制》一

宗家法”^①；是宋王朝赖以巩固政权的传家法宝。

应该承认，这种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于加强皇权，强化中央专制，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是行之有效的。实践的结果，宋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统一的局面，社会比较安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宋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农业、手工业、国内外贸易、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都有较大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发展过程的两个马鞍形中，宋代处在第二个马鞍形的最高峰。在当时的世界上，它也居于世界文明的最前列。一般地说，有宋一代，以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为最盛期，而仁宗统治时期，又以“庆历之治”最为著称。欧阳修《本论》概述庆历年间的天下大势，指出：“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②这正是北宋王朝处于鼎盛时期的写照。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基于自身内部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因素相互斗争，并渐次走向自身发展的反面。“祖宗家法”有效地实现了以皇帝为首的高度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这些集权措施的消极因素日益滋长，后继的真、仁、英三代又一味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不能依据发展了的新形势因革损益，变法而治，于是，自身内部的消极因素恶性膨胀。大约在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宋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冗兵”、“冗官”、“冗费”局面，形成日趋恶化的积贫积弱现象。

冗兵，指军队兵员冗滥，战斗力衰弱。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统计，宋初全国禁军连同厢兵，不过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八十年间，军

① 《长编》卷480

② 凡引用欧阳修文章篇目，未加注释的，均见于《欧阳文忠公集》

队数量增加两倍多。蔡襄为此痛切地说道：“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约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食天子衣食，五代而上，至于秦汉无有也，祖宗以来无有也。”^①宋王朝的冗兵，与“募兵制”很有关系。所谓“募兵制”，指荒年养兵，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宋太祖曾经自诩“募兵制”是赵氏传家之宝，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②。殊不知，连年招募，积兵成冗，而且军中老弱参杂，训练废弛，军队战斗力难免虚弱。

庆历初年的北宋军事实力，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家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③在北宋的对外战争史上，宋王朝确乎是“常战而常败”。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兵北伐辽朝，大败于高粱河（今北京外城一带），乘驴车狼狈而逃；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统军抵御契丹，以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而告终；庆历元年（1041）前后，宋仁宗用兵西夏，一败于延州（今陕西延安），二败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三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依靠不断地“屈己增币”，才维持北部、西北部边境的苟安局面。实践证明，宋代兵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腐朽的兵制，宋代军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无能的军队。

冗官，指官吏冗滥，官府行政效率低劣。宋初以来，朝廷滥施“恩荫制”，使大量官僚子弟荫补入官；又通过科举考试，大

① 蔡襄《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

②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以下简称《欧集》）·居士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量吸收知识分子参政，致使官吏数量与日俱增，机关衙门人满为患。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裁减冗员，一次便裁却十九万五千多人。^①然而，裁而复冗，仁宗朝冗官现象变本加厉，宋祁宝元二年（1039）称“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旧”。^②包拯皇祐元年（1049）《论冗官财用》云：“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县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县所任之职，素有定额，大率用吏不过五六千员，则有余矣，今乃三倍其多。”^③欧阳修至和二年（1055）说：“臣勘会本班见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员，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也。”^④司马光嘉祐八年（1063）奏议曰：“近日官吏繁冗，十倍于国初之时。”^⑤北宋中期官冗成灾，有增无减，从这些论述中可见一斑。

冗官充斥衙门，造成官府臃肿，人浮于事，“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⑥衙门重叠，各自职掌不清，遇事互相推诿，又加彼此倾轧，党同伐异，使得行政效率低劣。官吏无所事事，朝廷监察弛废，导致吏治极端腐败，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者比比皆是，就如欧阳修庆历年间所说的：“兵兴以来，公私困弊者，不唯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每或科率一物，则贪残之吏，先于百姓而刻剥；老谬之吏，恣其群下之诛求。朝廷得其一，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⑦

冗费，指费用冗杂，国家财政困乏。宋王朝沉重的经济负荷，首先在兵饷和官俸。由于冗兵，士兵不耕而食、“仰食天子”，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

② 宋祁《景文集》卷26《上三元三费疏》

③ 包拯《包孝肃奏议》卷1，又见《长编》卷167

④ 《欧集·奏议集》卷13《论使臣差遣札子》

⑤ 司马光《传家集》卷28《论进贺表恩泽札子》

⑥ 《宋史》卷161《职官志》一

⑦ 《欧集·奏议集》卷1《再论按察官吏状》

军费开支惊人。英宗治平初年，国家全年财政收入六千万贯，军费总额达四千八百余万贯，真所谓“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①由于冗官，官俸支出浩大。自祖宗以来，优礼士大夫，官吏俸禄优厚，每年支出钱约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还有皇帝对大臣的频繁“恩赏”，动辄银千两、钱百万。欧阳修说：“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②此外，国库支出还有繁重的对外贡纳：“澶渊之盟”后，宋廷每年奉赠契丹统治者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1042）增加到每年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朝廷又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赐”给党项贵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

冗费的结果，国家财力枯竭，朝廷财政发生严重危机。太祖、太宗时，每年国库尚有积储，到了真、仁、英三代，已是“民力困极，国用窘乏”，“百年之积，唯存空簿”。^③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英宗治平二年（1065）岁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贯，当年财政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贯，另有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贯，收支相抵，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贯。

综上所述，宋初“祖宗家法”的一系列措施，根除了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带来了社会的一度稳定和繁荣，但是，其弊病在宋初就已经初露端倪，在北宋中期导致严重的“三冗”现象，从政治、经济、军事上严重动摇了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面对朝廷颓势，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不安，纷纷抗言上疏，朝野上下响起一片改革朝政、拯救危机的呼声。

① 蔡襄《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

② 《欧集·奏议集》卷1《再论按察官吏状》

③ 《长编》卷143

第二节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宋真宗即位后，随着“三冗”现象滋生，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不断地有人挺身而出，慷慨陈事，呼吁改革朝政，兴利除弊。咸平元年（997），真宗即位之初，扬州知事王禹偁上《五事》书，主张“谨边防，通盟好”、“减冗兵，并冗吏”、“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沙汰僧尼”、“亲大臣，远小人”等五项改革。^①仁宗宝元元年（1038），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疏，声称国家之患在于“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②主张裁减官兵，节省靡费。但是，真正拉开朝政改革帷幕，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

庆历年间，潜伏在宋王朝繁荣昌盛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得以总爆发，朝廷陷入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就国内形势而言，“三冗”恶化，财政拮据。宋初以来“不立田制”、“不抑兼并”^③的土地政策，导制严重的土地兼并，加之连年地震，水旱频仍，阶级矛盾激化，先后爆发了王伦、张海、郭邈山、王则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欧阳修曾经对此哀叹：“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④就外部形势来说，祖宗既定的“守内虚外”方针，使辽国、西夏国坐以壮大。庆历初年宋夏决战，宋军连遭惨败，被迫岁贡银绢茶采。辽国趁机实施武力讹诈，迫使宋廷在“澶渊之盟”基础上增银加绢。宋王朝内外交困的窘境，就象欧阳修所说的：

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

① 《宋史》卷293《王禹偁传》

② 宋祁《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

③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

④ 《欧集·奏议集》卷4《论京西贼事札子》

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步。①

正是这种朝政危机，点燃了社会改革的希望之火。迫于形格势禁，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②，庆历三年（1043）三月，他罢免了久居相位、因循守旧的吕夷简，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并起用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人为谏官，共同谋划朝政改革。

同年八月，范仲淹综合自己多年以来的改革意见，写成著名的《上十事疏》，揭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并公布朝政改革方案，提出十大革新主张，即：“明黜陟”，严明奖惩制度；“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以恩荫制度滥进；“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方法；“择官长”，重视选拔地方官吏；“均公田”，平均地方官的职田收入；“厚农桑”，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修武备”，招募京畿强壮，加强京师防卫；“减徭役”，减轻农户负担；“覃恩信”，兑现朝廷宣布过的赋税赦免；“重命令”，慎重制订法令条文。富弼、韩琦等人也先后上书言事，补充修订十事。这十大革新主张，除第七项外，其它各项都先后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称之为“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惩治腐败，改革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十大新政内容，前五项都是关于整顿吏治的具体措施。范仲淹等人认为：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病根在于朝政腐败，而刷新朝政的要害在于整顿吏治，解决冗滥。因此，他们主张从整治“冗吏”着手，先从朝政体制开刀，限制贵族特权，提高行政机构效率，进而解决长期积累的系列问题，拯救国家危机。

① 《欧集·居士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② 《长编》卷140

由于新政内容触犯了贵族官僚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强烈反对。宰相章得象支持一些台谏官，接连不断地向范仲淹等人发起攻击。他们抓住最高统治者最为忌讳的问题，攻击新政领导人结为“朋党”，“怀奸不忠”^①。曾被新政派阻止就任枢密使的夏竦施展阴谋，诬蔑富弼指使石介撰诏草，谋废立，企图“行（伊）尹、霍（光）之事”^②。仁宗对此产生疑虑，富弼、范仲淹惶恐不安，请求出外按边。庆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次年，范仲淹又以“朋党”罪名罢免参政，支持改革的富弼、韩琦、杜衍、欧阳修一个个被贬官，受诬陷，大都被赶出朝廷。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仅仅推行一年多就夭折了。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王朝面临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三元”公害，财政危机愈演愈烈，一场更大规模的改革风暴正在酝酿爆发。

嘉祐三年（1058），度支判官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声称方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其主要原因不是“冗吏”，而是“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因此，他力主社会改革要以“理财”为中心，要“变更天下之弊法”，以适合当今世界的“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③

晚年的仁宗沉溺酒色，不思振治，哪有心思变法图强？王安石这篇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当然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公元一〇六三年，仁宗病死，英宗赵曙即位。此人志在有为，励精图治，想革除天下积弊，振兴祖宗家业。可惜他只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在位仅四年，首尾两年又病魔缠身，鸿图

① 《长编》卷154

② 《长编》卷150

③ 王安石《临川集》卷39

未展，溘然逝去。继位的神宗赵顼，年仅二十，血气方刚，锐意革弊兴利，可谓雄心勃勃，跃跃欲试，革新朝政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

神宗登位之际，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农民起义和士兵变乱的风潮已经平息，夏、辽的威胁也相对减弱，国家处于表面平静的和平环境。受到这种虚假太平景象的鼓舞，宋神宗“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①他想用兵辽、夏，统一中国，却又苦于国库空竭，财政窘迫。他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②然而，对于神宗皇帝“大有为”的政治主张，朝廷元老大臣不愿合作。三朝老相韩琦在神宗即位不久，坚决辞去相位，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老臣富弼在神宗问及边事时，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③在满朝元老大臣无可依傍的情况下，神宗属意于一贯力主变法的王安石。

熙宁元年（1068）四月，宋神宗召见翰林学士王安石，询问治国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越次入对，退而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重申“变风俗，立法度”的政治主张，宣称“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的见解，深受神宗赞许。次年二月，神宗不顾众多元老大臣的反对，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在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变法事宜，由王安石主领其事，同时启用由王安石推荐的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等一批新人，实施全面变法。

王安石新法，包括理财、整军、育才等内容。为了迎合神宗

①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

②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66

③ 苏轼《东坡集》卷37《富郑公神道碑》